皮尔斯符号传播理论研究

颜 青

摘要 皮尔斯符号学蕴含丰富、意义重大,本文主要论述其中的符号传播理论。皮尔斯在其符号学的第三个分支中论述了符号与其解释项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确定了团体、传播、探究的形式条件,实际上也就是确定了有效传播的形式条件。皮尔斯的这种符号传播理论独具意义,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皮尔斯 解释项 传播 团体 探究

On the Symbo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Peirce

Yan 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on the symbo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Peirce. Peirce organized a resourceful reasoning of sign and its interpretant, via which the formal condition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Inquiry became concrete, therefore, the formal condition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is symbol communication theory has unique significance and profoundly enlightened language researches.

Keywords Peirce; interpretant;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inquiry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是美国重要的思想家,有学者评价:“到目前为止,美国思想界所产生的最具原创力且多才多艺者是谁?其答案毫无异议是‘查尔斯·S·皮尔斯’,因为任何位居其后第二位者都将被他远远甩开而不值一提。他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大地测量家、勘测员、制图师、计量学家、光谱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词典编撰者、科学史家、数理经济学家、终身的医学学习者,书评家、剧作家、演员、短篇小说家、现象学家、符号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他是美国唯一的系统建构哲学家,在整个哲学史上,若在这些方面尚有与之匹敌者,不会超过两个。”^{[1](17)}在对皮尔斯的众多称谓中,其中一个语言学家,皮尔斯一生共写了不少于一百二十七篇关于语言和语言学的论文,他的符号学理论对20世纪两位语言学领袖人物——乔姆斯基和雅各布

森——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正是由于皮尔斯,语言学确认了语言符号传播功能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问题。^{[2](121-126)}皮尔斯关于符号传播的学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在探讨符号与其解释项关系的过程中,确定了团体、传播、探究的形式条件,实际上也就是确定了有效传播的形式条件。

一、符号与其解释项

皮尔斯认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由对象、表象(符号)和解释项三部分组成,由此其符号学由三个分支构成:第一个分支是符号语法,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皮尔斯符号学研究”(12YJC75203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比较文学中的文化传播研究”(2011QNWX40)和重庆师范大学基金项目“比较文学中的传播问题研究”(10XWB035)的阶段研究成果。

讨论符号表象自身,即符号的形式条件;第二个分支是批评逻辑,讨论符号与其对象间的关系,即符号为真的形式条件;第三个分支就是一般修辞,讨论符号与其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即获得真理的形式条件。在皮尔斯看来,符号对象决定符号^{[3] (Vol. 2, 497)},符号作为传播媒介,由发送者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对符号的理解被称为解释项,随后解释者又转变为发送者,将已成为符号的解释项发送给下一个接收者进行理解,由此而得到新的诠释,如此延续发展,以至无限。

解释项是理解皮尔斯符号学及其符号传播思想的关键,它是解释者对符号进行感知、解释的效果、程序和产物。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解释项可以看作对符号的翻译。符号的对象是有限的,但经由符号对这个对象的翻译是无限的。皮尔斯对解释项进行了多种划分,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将其分为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并在一般修辞中分别讨论了符号与它们的关系。

(一)直接解释项

直接解释项是符号“意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总体的不分析的效果”。^{[4] (110)}作为解释者对符号进行感知的产物,它包括所有的第一性——感觉、模糊印象、质、一个努力的概念(不是努力本身),或者一个普遍类型的观念。比如,听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总体感觉。

符号与其直接解释项相关联的结果就是产生符号的直接明见性。它是符号在一个意识中首先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效果,毫无反思性。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修辞是研究符号明见性的基本条件或符号诉诸于意识的能力。

符号与其直接解释项相关联的产物是感觉、情绪、印象、直觉、本能、念头、自明性等这一类东西。在连续的符号翻译过程中,它们形成一种“话语体系(a universe of discourse)”,^{[5] (Vol. IV, 146)}或称为符号代理者的共识,被符号解释者在连续体中与其他参与者分享,其效果就是在连续体的成员那里创造某种易感性或易理解性,而这个连续体就是团体。

(二)动态解释项

动态解释项是“符号作用于某些解释者的直接的或事实的效果”,是“符号作用于解释者的努力的效果”。^{[4] (110)}这种努力可以是物理的,比如可见的行动;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思考。它的产物属于第二性范畴,比如行动、事件。

符号与其动态解释项相关联的结果是一个符号作用于符号解释者的直接效果,它能够将动态对象的信息传达给解释者。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修辞是研究“通过符号由一个意识向另一个意识,由意识中的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换意义的必要条件”,^{[5] (Vol. 1, 242)}即如何让符号有效的研究。

符号与其动态解释项相关联的过程就是传播,它存在于任何解释者之间,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也是可以传达关于它自己的信息的。而在人类传播的案例中,通常传播的产物就是信息,传播的效果就是理解。^{[4] (197)}

(三)最终解释项

最终解释项是对一个符号系统化的翻译。一方面,最终解释项作为符号翻译的产物,可理解为符号提供的对信息的陈述。这种陈述会随着系统的发展而变化,比如人们对美的定义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最终解释项可以理解为翻译的规则,主要依据批评逻辑中的推论,为符号系统的发展、推进和完善提供方法。最后,最终解释项作为一种效果,确定符号解释者在符号系统中的解释习惯或行为习惯,符号由此成为符号解释者的鲜活的体验。这三个方面,信息由于推论的扩展或系统的完善而改变;同时系统的信息导致含义在符号解释者行为中的改变;解释者的行为使系统成为以其为基础的推论的指导。最终解释项是符号中最重要的要素,它通过自身包含的推论规则而产生信息。

符号与其最终解释项相关联的结果不仅与其所属的符号系统的增长和发展相关,还与符号作用于解释者的重大意义效果相关,与解释者的习惯的确定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修辞就是研究确定最终解释项的条件;是研究人类意识史中理性的发展;是达成意图、普遍

目标的一般方法原理。

符号与其最终解释项相关联的过程,就是符号的意义,也就是一个符号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探究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二、有效传播的形式条件

皮尔斯在讨论符号与其解释项的关系时,确定了团体、传播和探究的形式条件,实际上也就是确定了有效传播的形式条件。

(一)传播者必须形成某种特定的团体

所谓团体,皮尔斯认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能解释符号的。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传播只发生在符号代理具有三元符号能力,可以相互交换“发送者”和“解释者”的角色,为对方发挥符号功能的情况下。自然符号——二元符号,比如雪地上的鹿脚印,它自身不能形成解释项,不具有三元符号能力,所以它对于猎人来说只是一种形式或性质的传达,而不是一种传播。第二,成员之间必须存在传播的联系,也就是说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特定的传递。皮尔斯认为传播中传递的是发送者所指称的对象的形式或性质。“为了使形式是可以扩展或传播的,它必须真正包含在一个独立于传播的主体中;而且必须有另一个主体,在其中只能是因为传播而包含这个相同的形式。”^{[4] (196)}这就是说,形式或性质的简单传递不足以成为传播,必须要能够在解释者那里确定解释项,并在某种意义上与它在发送者那里所确定的解释项是相似的。换言之,发送者和解释者能够被传递的符号焊接或熔合起来,能够相互理解。这种焊接或熔合被皮尔斯称为“共同解释项”。^{[3] (196)}由此,第三,成员之间的联系要被确定为“我们的”,即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某种认同,也就是发送者与解释者要能够形成共同解释项。“共同解释项”是一种共识,共识的定义和“话语体系”的概念相似。话语体系是对世界的共通理解,通过经验和前见获得。比如要理解“哈姆雷特疯了”这个命题,“一个人必须知道有时人们会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必须看见过发疯的人或者读到过

他们;而且最好是特别地知道……莎士比亚对疯狂的定义。”^{[5] (Vol. VIII, 136)}发送者这个符号对于解释者来说必须是常识的一部分,这在理论上使发送者与解释者的角色互换成为可能,从而使对话成为可能,形成矫正的互换,这对于探究是相当重要的。

要保证传播有效,这个团体必须是某种特定的团体,需要其成员培养起对传播的特殊情感和对探究目的的渴望。皮尔斯曾提出“对不确定团体的兴趣”、“对最高兴趣的可能性的认识”,以及“对无限连续的智性活动的希望”,这三种情感是“逻辑学必不可缺的要求”。^{[5] (Vol. II, 399)}由此看来,首先必须存在某种超个人主义。一个个体必须期望他的兴趣至少是部分地与这个不确定团体的兴趣密切相关,并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团体成员必须有某种“社会冲动”,它包含团体意识的培养,以及对对我们只是“社会组织的细胞”的认识。^{[5] (Vol. I, 361)}除此之外,团体成员还必需具有对探究目的的渴望,即对真理和合理性本身的渴望。在一般传播中,这种渴望则首先是对一致意见的渴望。

(二)必须达成传递的确定性

在皮尔斯看来,“诚实的人,只要不是开玩笑,会想要确定他们词语的意义,这样就根本不存在解释的自由。”^{[5] (Vol. V, 299)}传播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达成解释的零自由,即发送者与接收者达成对意义的一致意见。传播的过程是发送者与解释者不断互换角色进行对话的过程,就像一个圆锥形的螺旋,一种盘旋上升的朝向一个固定的点的运动,这个点表示完全的确定,再不存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的解释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皮尔斯认为对话过程是一系列由发送者和解释者演示的明确的标准、规则、责任和义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设定说话行为的理论。由此,传播就是要达成传递的确定性,消除不确定性。

皮尔斯认为不确定性包含两种:一种是模糊性,一种是概述性。在发送者与解释者对话的语境中,概述性给符号解释者留下了进一步确定的空间。关于模糊性,皮尔斯认为是“决定权没有明确地扩伸到解释者,它保留了

发送者的权力”。^{[5] (Vol. V, 354)}这就是说,命题的断言者故意留下漏洞以方便自己进行自由解释。一个命题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命题中术语所指称对象的不确定,或者是将意义归因于通过它而被指称的对象的不确定。比如“有些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是指哪些人是不确定的。

通常,确定一个意义与共识或话语体系有关,也与传播者的意图相关;一个确定的意义是针对所有可能的话语体系或讨论团体而言的。简单的传播行为就是试着确定基本术语的指称物和意义,而当更为复杂的言语行为卷入其中,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作一个断言至少有两个传播层面要考虑:一方面,命题内容的传播,比如“今天天冷”,另一方面,命题语境的传播,即“我认为今天天冷”。在第一个层面上,发送者想要解释者明白(在理性意义上)他所断定的,即确定命题中所用术语的关联物和意义。在第二个层面上,断言不仅是命题内容的交流,还与发送者的其他意图相关;对于解释者来说它还包含着对这个命题内容做点什么的尝试,而不仅仅是理解它,换言之,不仅理解,还表示认同,创造出奥斯汀(J. Austin)所说的言后效果。传播所包含的不仅是命题内容,还有关于命题的传播意图。在这种语境中,共同解释项就是产生于传播过程的共同效果。它不一定就是解释者对命题内容的认同,却是在发送者和解释者之间建立起对命题的确定及其效果的共同理解。由此,传播的目标就是将发送者对命题内容为真的确定传递给解释者;解释者有权要求证据,不仅是发送者关于确定的真诚,还有就是命题的真实;相应地,发送者要准备好提供这种证据;如果这些观点演示成功的话,结果就是发送者相信解释者相信了他所相信的,而解释者也这样认为。

(三) 整个过程必须具有纠正的特质

如前所述,符号的意义表现在它的成长和发育中,主要是通过探究来实现的。而相对于简单的推论,探究是一种实践的生活模式,是一个公共过程,是不断发展和成长的;它需要一定数量的个体的合作,并且在某个特定的

团体语境中产生;是皮尔斯心中最理想最科学的传播。探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信念的确定,或“普遍意义上的一致意见”^{[5] (Vol. VI, 433)}的确定。皮尔斯论证:如果一组探究者对独立于他们每个人观点的某物进行足够长时间的研究,那么这种独立性(假设这个实在是充分稳定的话)将保证他们的观点将最终互相趋同,并达成一个共同的信念。原因在于,依据实效主义原则,进入意识的任何事物,它的意义都在于它可以被想象到的实际结果中,由此所有可想到的东西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探究到达成一个最终意见的。“个体探究者的环境、权力、爱好的局限性”所引起的特异性是错误的来源,而它们会在探究这个公共过程中被过滤掉了。^{[6] (89)}由此,在同一个问题的探究中,不同探究者的不同步骤最终会到达一个“注定的中心”,好比地球的自转可以正确地从天体运动、光线偏差、钟摆改变摆向等不同证据中得出。

当对信息的陈述越发接近对真实的确切表达时,就会导致一种符号解释的习惯,会尽可能长远地保证对世界的正确态度和行为。由此,探究团体向着皮尔斯所说的“实在合理性”发展。探究团体要如何达成实在合理性,这在于对目的行动的准确理解。亚里斯多德把目的因视为完美程序,而皮尔斯认为目的因显现于它掌管的现象之前(空间的),而不是存在于它们之前(时间的)。更特别的是,皮尔斯认为秩序是从偶然或混乱发展而来。^{[5] (Vol. VI, 25)}这种过程可称为“finious”,即“事物有向一个最终状态运动的倾向”,“一种普遍性质的状态”。^{[5] (Vol. VII, 286)}比如气体分子的任意运动不可逆转地倾向于一个结果,就是气体的均匀散布。在某种意义上,气体分子的运动是被纠正的,直到分子均匀分布。由此“finious”的最本质特征就是纠正,而在探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finious”过程的最高表现。因为纠正是由过程中的变化和选择表现出来的。类似于气体分子的运动,人类为了达到某个目标会纠正他们的行为。“人类精神程序是可以自我纠正或自我控制”^{[5] (Vol. V, 279-280)}的,即意向性地选择和变化的。“一个符号的全部

意图就是要被另一个符号解释”^{[5] (Vol. VIII, 148)}“一个命题可以翻译为无数的形式,哪一个才是它真正的意义?依据实用主义原则,它是那个形式,以这个形式命题适用于人类行为……这个形式最直接地适用于自我控制……”^{[5] (Vol. V, 284-285)}而探究的目标就是要确定哪一种翻译是关于那个符号的真正的合适的发展。^{[5] (Vol. IV, 11)}在探究过程中,我们看到一种朝向符号的确定和解释的运动,它们的效果创造了某种解释和行动的习惯,习惯以一致意见的“实在合理性”告终。依据皮尔斯的观点,“至善不在于行动,而在于进化的过程,存在由此而越来越包含那些被称为指定的普遍之物,也就是我们努力称之为合理的东西。在它的更高阶段,进化更多更广泛地是通过自我控制来发生。”^{[5] (Vol. V, 289)}

三、皮尔斯符号传播理论的意义及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符号对象、表象(符号)和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使皮尔斯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符号的指示过程可以延续、递进、发展,以至无限。这使符号的范围变得非常广泛,包括规则、习惯等。如此一来,其符号传播理论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对很多领域比如语言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皮尔斯符号传播理论的意义

首先,皮尔斯的核心洞见是,意义是一种三元关系,由于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不可化简的三元关系,目的和意义包含在符号的所有运用中。意义不能简化为质或者事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或语言游戏中将质传递给事实的东西。其次,皮尔斯的理论从人类经验的角度出发,没有否定语言的社会性,既没有把人作为中心,也没有不把人作为中心,它只是让意识和语言相互依赖。由此,所有意义都是对于我们而言的。再次,皮尔斯的理论包含了质的符号和事实的符号,但他没有作关于比思想中的东西更绝对的事物的形而上假设或陈述。^{[7] (82)}皮尔斯明确地考虑了真实、实在和真理;不过这些是符号,是意识中的符号,

是信息和推论早晚最终会得出的结果,由此是独立于人的所想的。它们不是形而上的虚构,也不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虚构,而是定位于未来的概念,是意识团体的“最后产物”和“最终意见”,个体永远不能全面感知它们。它们是精神活动的普遍和一般产物,而不是精神活动的难以察觉的原因。^{[7] (82)}第四,依据皮尔斯的观点,由于语言自身的性质,语言并不决定我们是否把人看作创造的神或者傀儡,语言是一种中介,允许我们选择这些看法。我们的世界观和理论,都纯粹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事物,不过我们必须接受自由的负担,对我们世界的意义负起责任。世界的意义符合我们的理论和信念,这是非常必要的。最后,借用雅各布森关于语言学、符号学和一般传播科学三者构成的同心圆,皮尔斯的符号传播理论实际上将三者统一了起来。

(二)皮尔斯符号传播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皮尔斯,语言学确认了语言符号传播功能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雅各布森等认为,传播功能是自然语言符号的一种关键特性这一重要发现就应该归功于皮尔斯。另一方面,皮尔斯关于符号在特定团体中传播的学说在语言学领域得到共时和历时两个纬度的延伸。在共时纬度,语言团体的传播半径理论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彰显出地域和社会两类特性,这和语言符号跨职业、跨地域传播的特点密切相关。萨丕尔(Edward Sapir)最初提出的这一理论假设已经由语言学界沿着皮尔斯的符号学路径做出了长足拓展。在历时纬度,皮尔斯认为处于传播中的符号有助于实现现今与历史的对话,即使一个人的内部言语也具有传播的特性。雅各布森首次发现了这种符号传播学说和语言研究间的某种平行或因果关系。^{[2] (123)}

雅各布森认为皮尔斯的解释项与符号的表象和对象的关联是现代语义学和翻译理论形成的原点。在现代语义学里体现于词汇、语法及语用平面的意义转述就其本质而言,与借助解释项实现的符号转译如出一辙。而从符

号学的角度判断,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则意味着对于从一种符号类型向另一种符号类型转译的可能性的认知,并且有助于揭示其间存在的深层结构或功能上的相似性,消除传统上施加于不同符号类型之间的过分夸大的区别。^{[2] (123)}

受皮尔斯的影响,雅各布森认为意义不是一个从发送者传递到接受者的稳定不变的实体,意义存在于全部传播行为中,受六种因素制约,是动态的意义获得过程。^{[8] (115-133)}任何一个语言行为的成立决定于以下六个因素:语境、代码、发送者、接收者、联系和信息,^{[9] (214)}它们分别对应语言的六种功能:指称功能、元语言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联络功能和诗学功能。无须对雅各布森的论述作任何改动,就可以将其翻译为皮尔斯式的论述。发送者将信息与一个对象联系起来,信息到达一个接收者,接收者处于一个文本中,这个文本和发送者的可能不一样。由此,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代码是不同的,接收者可能给发送者的符号表象一个不同的直接对象或者意思。在此,解释者是所有解释项的会合点,要么符号表象,要么符号行动中的习惯。在一个情境或文本中,接收者或解释者既是精神生理性的联系,又是社会性的代码,还是一个可能的解释的文本。^{[10] (125-126)}

皮尔斯的符号传播理论意义重大,对语言研究影响深远。雅各布森曾把皮尔士与惠特尼、鲍阿斯、萨丕尔、沃尔夫、布隆菲尔德一起并列为“美国语言科学产生的几位著名的、杰出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11] (265-278)}

参考文献

[1]Fisch, Max H. Introductory Note // In Thomas A.

Sebeok, *The Play of Musement* [M],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卢德平:略论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J], 2006年第4期。

[3]Peirce, Charles S. *The Essential Peirce* [C], Ed.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8.

[4]Peirce, Charles S. *Semiotic and Significs :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arles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C], Ed. Charles S. Hardwick, and J. Cook,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5]Peirce, Charles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 Vols. I - VI. Ed.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Vols. VII - VIII. Ed. Arthur. W. Burk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5, 1958.

[6]Peirce, Charles S. *The Essential Peirce* [C], Vol. I. Ed.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7]Peirce, Charles S. *Charles S. Peirce : Selected Writings* [C], Ed. Philip P. Weiner,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58.

[8]Jakobson, Roman.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 On Language* [C], Ed. L. Waugh and M. Monville-Burston,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Jakobson, Roma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 Paris : Edition de Minuit, 1963.

[10]Deledalle, Gérard. *Charles Peirce's Philosophy of Signs : Essays in Comparative Semiotics* [C].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Jakobson, Roma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nguistics : Movements and Continuity // Selected Writing VII* [C], Berlin : Mouton de Gruyter, 1985.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